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22

2008年3月3日

歷史的曲折應該歷史地反思 ——《心路滄桑》創作感言¹

四川省國家稅務局 高戈里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序列裡，曾經長期保留了一支非常獨特的野戰軍，這就是由國民黨第60軍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50軍。

1946年5月，國民黨第60軍184師於海城起義，在經歷了安東整訓、石人車站叛變事件的曲折後，我黨終於摸索到了以控訴運動為核心內容的舊軍隊改造之路，進而在隨後的興隆整訓中，使該部脫胎換骨成為人民軍隊。1948年10月，國民黨第60軍在

¹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長春起義後，我黨迅速派去了以海城起義官兵為主體的四百多名中共黨員幹部，輕車熟路地實現了數萬起義官兵於歷史瞬間的靈魂聚變。1950年10月，該軍首批出國抗美援朝，打出了國威、軍威，獲得了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司令員的交口讚譽。²

開啟塵封半個多世紀的“國軍”改造史，有著許多難以估量的現實意義。而我對其重要意義的感悟，也經過了一個曲折的認識過程。

坦白地說，最初，我只是為了打發閒暇時光，才把工餘精力全部投入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的創作。由於遠離了“淚血大控訴”的年代，創作前，我耳聞目睹多是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所以，最初的創作曾帶著先入為主的成見，企圖從最後一章落實起義人員政策走筆，評說前輩們的“左”和“封建主義”，並試圖剖析中國的法律文化：情重於法的親情（階級）復仇意識，理高於法的“義務本位”觀念，權大於法的人治傳統思想。

然而，當我這不知天高地厚的思緒沉浸於當年的淚血環境和榮辱氛圍，沿著前輩們的心路軌跡延伸到舊中國的“三座大山”之下時，我卻茫然了。

茫然的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捫心自問：我若當初，又若何？

一、舊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能不能不信

有關舊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雖然史料有所記載，但是，就像當初的我，許多當代中青年人還是持懷疑態度。一位文化界的朋友甚至如是斷言：“咳！‘國軍’和‘共軍’一個樣！”

² 高戈里：〈感天撼地50軍〉，《中國作家·紀實》雜誌2007年第10期。

截止 2007 年 3 月底，在我採訪的近二百名歷史親歷者中，有 116 名原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二人、團職八人、營職四人、連排職 19 人、士兵 83 人，另有隨軍眷屬六人。凡是從舊軍隊過來的老人，對那位文化界朋友的斷言沒有不搖頭的，甚至一些坐過共產黨大牢的起義人員也不例外。

原國民黨暫編第 21 師中校副團長馬佔偉告訴我：“雖然不是所有的軍官都‘喝兵血’，但舊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千真萬確！”這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老人轉業到地方後，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三年。然而，在 69 歲那年，還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了卻夙願！

對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起義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雲南省石林縣的起義士兵符啟元、張珩等，說到在舊軍隊挨打，時至今日，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半個多世紀了，張珩當年被軍官用扁擔打折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老人被淚水浸泡的心靈感受，有兩句很值得回味。一句雖然低語輕聲，但卻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國民黨太壞了！”另一句雖然也聲輕平調，但卻是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不管怎麼說，毛主席太偉大了！”

有人猜測：殘酷欺壓士兵的，是地方軍閥部隊。國民黨嫡系部隊的軍官多出自黃埔軍校，是有知識的人，不會那麼殘忍吧？

哲學家 and 音樂家故鄉的德意志，曾經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鉅魔。背棄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軍校也不例外。胡宗南可謂之蔣介石的嫡系，據其所屬第 7 兵團的起義士兵揭發，該部的一些軍官殘殺士兵更令人髮指：

第 55 師一位姓朱的參謀主任曾命令直屬連連長：“凡是士兵犯了錯誤，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處罰士兵時，當場挖出士兵的心臟，掛了兩大串。士兵揭發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 349 團 2 營一位姓石的排長要雞姦一名士兵，被拒絕後，石排長竟弄來一根紅蘿蔔往這位士兵的肛門裡硬塞！

據統計，第 144 師 2451 名士兵在舊軍隊期間，有 345 人被吊打過，289 人被捆打過，1238 人被棒打過，13 人被刺刀打過，677 人被槍托打過，1362 人被打過耳光，945 人被皮帶打過，991 人被拳打腳踢過，53 人曾被打得昏死過去，20 人被打得吐了血，22 人被打殘廢，1298 人被罰過跪，535 人被罰過凍，128 人被罰過曬，1302 人被罰過挨餓，一人被罰過喝尿，一人被罰過吃地痰，被槍斃未死的有 33 人，被活埋未死的有 24 人……

該兵團的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 472 團 2 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 31 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 35 人。³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 473 團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准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復了正常。

對於國民黨軍內部的階級壓迫，在大海彼岸，在國民黨官方文獻中，我們都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飢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

³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等，《成都文史資料》第二十九輯第 173 頁。

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⁴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瞭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並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於他們是半飢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剋扣’很大一部分。”⁵

美國著名記者、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白修德1939年赴重慶報道中國抗戰新聞，任美國《時代》雜誌通訊員、遠東首席記者，他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記載：“整個中國都沸騰於徵兵拉丁的浪潮中，而徵兵之殘暴野蠻，冷酷無情，以及貪污舞弊，就算在中國最黑暗的史跡上這也是惡劣透頂的。……當歐洲貝爾遜和布欽華爾德集中營的慘絕人寰的故事傳來的時候，那時正是中國這種徵兵的高潮。在成都參加壯丁營工作的醫生對於德國的這種恐怖手段並不覺得驚訝，他們說，一切關於納粹集中營的描寫，簡直就和他們所工作的壯丁營一式一樣。靠近成都的一個壯丁營要接受四萬個壯丁來受訓入伍，但是在來營途中有許多人就已死了，能夠活著拖到訓練終了，結果只有八千人。”⁶

抗戰中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作過一次實地考察，考察結果令他觸目驚心：新徵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三百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一千人，至貴陽僅餘一百餘人。死亡壯丁與

⁴ [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轉引自《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3頁。

⁵ [美]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十一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⁶ [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端納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第313頁。

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 11 比 1。⁷

蔣夢麟在其兵役狀況的視察報告中寫到：“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衆”，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⁸

抗戰八年，國民黨政府公佈的實徵壯丁數為 1405 萬人，⁹ 同期國民黨軍隊減員總數為 417 萬人¹⁰（含逃亡 32 萬人，不含投降日軍後被改編為偽軍 50 萬人¹¹），抗戰壯丁命運之慘，非正常減員數額之大，觸目驚心。¹²

面對國民黨軍隊種種劣跡，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甚至“噁心透了”！¹³

對此，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一書中有過經典結論：“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

⁷ 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 2000 年，第 294~300 頁。

⁸ 蔣介石：〈知恥圖強〉，刊載於《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至九月份第 151~152 頁；轉引自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刊載於《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⁹ 見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所附〈抗戰期間各省歷年實徵壯丁人數統計表〉，（臺北）文海出版社。

¹⁰ 宋波：《抗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華文出版社 2005 年，第 460 頁。

¹¹ 〈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解放日報》1943 年 8 月 13 日。

¹² 本文作者對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情況有過專門考證，見高戈里的博客文章〈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37526>。

¹³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北京出版社 1982 年中文版，第 230 頁。

釋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¹⁴

二、改造舊軍隊的控訴運動能不能不搞

在 20 世紀的中國，曾經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的階級仇恨，是由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直接引發的。就社會心理而言，這種普遍的社會情緒與後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有著“源”與“流”的必然聯繫。由此，一些有責任感的中國學者開始反思中國走過的革命道路。

20 世紀末，這種反思引發的思想界爭論空前激烈。

1995 年，曾被稱為“80 年代中國思想界的領袖”的李澤厚和另一位著名學者劉再復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告別革命》的對話集，批判中國在 20 世紀選擇革命道路而沒有選擇改良道路，“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¹⁵

2000 年 1 月出版的《前沿文化論爭備忘錄：知識分子立場》叢書彙集了中國思想界這場論戰的精華文章，其中對中國革命持否定態度的學者，試圖從半個多世紀前中國出現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尋找走“中間道路”的思想資源，並為當年民主同盟“出色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無法獲得其實踐的機會”，感到由衷的“可惜”。¹⁶

無巧不成書，中國共產黨改造海城起義部隊的過程，恰恰提供了與民主同盟“中間道路”密切相關，並需要中國當代思想家

¹⁴ [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轉引自《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87 頁。

¹⁵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995 年，第 74 頁。

¹⁶ 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0 年，第 482 頁。

予以理論解析的“實踐機會”。

國民黨第 184 師海城起義後，被整編為“民主同盟軍第 1 軍”。中共中央當年之所以同意這一命名，主要出於統一戰線的策略考慮。但問題又不僅僅於此，據記載，當時確有不少起義軍官主張“請民盟來領導這支部隊”，一位將領甚至公開宣稱：“我們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參加共產黨，我們是中間派。”¹⁷

20 世紀 40 年代，昆明城聚集了一批讚賞歐美民主制度的愛國知識分子，其黨派社團以“三黨三派”聯盟組成的民主同盟影響最大。當時，民主同盟雖然在國事主張上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但在社會理想及實現道路上，其“許多領導人物代表著中產階級的想法，企圖在國共對立的綱領之外，尋找出第三條道路”。¹⁸

當年，地方軍閥的官佐階層之所以鍾情於“第三條道路”，決非偶然，除了其固有的政治立場，以及顧及“前途”外，根本原因在於改良主義能保全壓迫者在“主奴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也正因如此，不少軍官雖然在起義後提昇了職務，卻仍不滿足：“當八路只昇官，不發財！”

據士兵吳榮珍回憶，他的連長在軍官中屬於少數思想比較開明的，但起義後也顧慮重重：“當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窮。”

和其他舊軍隊一樣，第 184 師起義前，相當一部分軍官打罵士兵、殘殺逃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邊毆打士兵，一邊公開宣稱：“這叫黑暗專制！”士兵劉紹雲所在連隊從雲南開赴越南受降途中，軍官只要發現士兵走不動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腳

¹⁷ 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 1947 年報告《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第 6、8 頁。

¹⁸ 《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第 284 頁。

蹬下紅河。士兵江源濤親眼所見，一名士兵因罵了營長，軍官便“集合全連實行千刀萬剮，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劉家祿在雲南路南時，連長曾逼迫他吃逃兵的肉，劉家祿不肯吃，連長就威脅：“你們當班長的不吃，就吃你的肉！”¹⁹

基於這種殘酷的人身壓迫，官長對士兵經濟上的盤剝就更不在話下了。

面對延續數千年的社會基礎，別說企望壓迫者大發慈悲主動革除維持其統治地位的舊制度是天方夜譚，就是通過外力實施溫和的改造，也阻力重重。與後來興隆整訓發動廣大士兵群眾開展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相比較，最初只採取正面說理教育的安東整訓是溫和的。然而，這種溫和的改造卻開展得異常艱難。

在起義將領中，潘朔端、馬逸飛雖然思想基礎較好，但最初並沒有完全掌握控制部隊的實權。

安東整訓之初，為了避免“影響部隊的整個改造”，遼東軍區曾要求起義部隊抽調一批軍官赴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學習，但想調的軍官就是調不出來，甚至“明知是特務”也調不出來，結果只送去 80 多名書記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後來再抽調 80 來人，還是這樣。²⁰

要推行八路軍那套基於官兵平等原則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也難。不少軍官習慣於舊軍隊的“人事獨裁”和“經濟獨裁”，反對經濟公開，強調“絕對服從”。

軍官中的吃喝嫖賭抽等惡習也十分嚴重。在四百多名軍官中，公開要求治療梅毒病花柳病的就有 30 多人。在參謀處和醫務處，

¹⁹ 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 1947 年報告《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第 27 頁。

²⁰ 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 1947 年報告《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第 10、13 頁。

抽鴉片的軍官甚至公開擺燈。²¹

最初一段時間，共產黨的政治工作幹部和一些起義軍官經常發生矛盾。混成團政治處蒙主任對舊習嚴重的起義軍官看不慣，合不來，沒幹幾天就賭氣回老部隊了。為這事，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領導專門對政治工作幹部進行了教育：在我黨尚未完全掌握起義部隊的情況下，穩定軍官隊伍對穩定整個起義部隊至關重要，幫助教育起義軍官要有耐心，要講究方式方法。

政治工作幹部後來“講究”起來的“方式方法”，現在說起來還真有點好笑，叫“疲勞麻煩政策”。舊軍官帶兵特別關注“鞏固部隊”，因為兵跑光了，自己的官位也就保不住了。但他們又很官僚，不願深入士兵群眾做艱苦細緻的思想工作。針對這些特點，政治工作幹部就從關心軍官自身利益的角度，來宣講八路軍帶兵的民主傳統，讓他們高興。一些軍官聽了雖然同意，但嫌“麻煩”，於是，就把工作推給政治工作幹部。軍官越推，政治工作就越是要“疲勞麻煩”他們，特別是在他們急於去抽、賭、嫖，暫時還無法制止的時候。

對士兵的啟蒙教育也不容易。士兵的奴性根深蒂固，認命，習慣於盲目服從。

安東整訓雖然在起義部隊中初步推行了民主制度，爭取了部分官兵，但整體改造效果並不理想。所以，當國民黨軍大舉進攻南滿解放區時，我軍領導曾預料起義部隊可能會“翻船”，於是，在其向北滿解放區轉移途中最危險的寬甸以東地段，安排四分區的部隊作了預先戒備。不料，楊朝倫副師長還是策動 1300 餘人在東滿解放區的石人車站叛變了。²²

²¹ 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 1947 年報告《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第 6 頁。

²² 轉引自劉統：《東北解放戰爭紀實》，東方出版社 1997 年，第 452 頁。

石人車站叛變事件發生後，從反面促使共產黨人認真總結了改造起義部隊的經驗教訓。用溫和的正面教育的方法改造舊軍隊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條件，這在戰爭年代極為困難。要克服困難，就不能不去尋找改造舊軍隊更有效的方式。

據記載，為尋找這場政治戰役的突破口，早在安東整訓後期，徐文烈等政工幹部就通過調查發現，多數士兵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無敵意，卻痛恨鄉、保長和惡霸地主。鑒於初期的整訓多從正面宣講國民黨“賣國獨裁”、“壓迫人民”，結果不但與起義士兵親身感受距離太遠，還與其“正統”觀念相衝突，於是改為先從士兵所受的具體剝削壓迫講起。

不料，我政工幹部剛“摸到一些頭緒”，“反省訴苦坦白綜合性的大會”“正轟轟烈烈起來”，就被國民黨大舉進攻打斷了。雖然，此時已在整編後的五名軍、師起義將領中發展了兩名中共黨員，還爭取到 15.6% 的中下級軍官為“進步分子”，但由於對軍官爭取不夠，對反動分子的清洗也不夠，“舊制度舊紀律軍官壓迫士兵，士兵機械盲目執行命令的反動思想傳統未打垮”，大規模的叛變還是發生了。

鑒於安東整訓的經驗教訓，海城起義部隊剩餘兩千餘人到達北滿根據地興隆鎮後，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幹部改用“倒過來講”的辦法——讓起義士兵先控訴家人受鄉鎮保長、甲長和惡霸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控訴本人在舊軍隊受長官的欺壓，再宣講國民黨政權維護這一舊制度。

果然，興隆整訓一“倒過來講”，幾乎是瞬間，廣大起義士兵就徹底覺悟了。²³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剛石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但它們的硬度

²³ 民主同盟軍第 1 軍政治部 1947 年報告《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第 18~23 頁。

卻有著天壤之別，原因就是在於它們各自的空間結構不同。徐文烈等我軍政治工作幹部在改造海城起義部隊的實踐中，發現政治教育內容和形式的排序直接影響教育效果，終於在“倒過來講”的嘗試中，找到了改造舊軍隊最有效的內容和形式——控訴運動，由此引發了廣大起義士兵群眾內心深處的那種能夠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靈魂聚變。

一位叫谷德貴的起義人員經歷了控訴運動後感慨承認：“在安東時，誰最反動，怪話最多，那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最高。現在呢？誰要反動，誰不進步，誰就被大家看不起！”

改造滇軍的成功經驗，在解放戰爭後期，毛澤東主席曾親擬電文予以推廣。²⁴ 第50軍徐文烈政委也因此於成都戰役結束後，被其他野戰軍改造起義部隊的工作團請去作了專題報告。後來，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胡宗南系統第七兵團的實踐，又創新出公祭宣誓活動，祭奠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裡屈死的親人。據記載，該兵團感天慟地、盛況空前的公祭宣誓後，有92%的起義官兵遞交了請求參加解放軍的決心書，內有44.1%的起義官兵在決心書上用鮮血簽名或按下血指印，有7.3%的起義官兵遞交了血書。²⁵

已然的歷史有著歷史的必然。

對民主同盟的一些盟員來說，是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及特務暴政，打碎了自由主義的海市蜃樓幻想，才有其接受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對“中間路線”的徹底拋棄。對部分起義軍官來說，

²⁴ 1949年5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中共中央華中局的電報指示：對張軫部“按照改造曾澤生、吳化文等部的辦法加以改造”。《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軍事科學院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94頁。

²⁵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7兵團的回憶》，《成都文史資料》第二十九輯第175頁。

是受欺壓的士兵群眾的哭訴，批判了“中間道路”的政治選擇，才喚醒了施壓者扭曲的靈魂。他們殊途同歸，最終都匯集到鐮刀鐵錘的紅旗之下。

有此殊途同歸，不少起義官兵才異口同聲評價：“控訴運動好啊，不是人民軍隊學不去！”

三、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歷史曲折能不能不走

當代思想界的一些知識精英對中國革命責難最多的，是階級鬥爭擴大化問題。

最初，我也曾把有關起義人員落實政策的歷史問題，統統歸咎於中共“左”的錯誤。從局部看，起義人員中的“冤假錯案”確實存在，但若整體評價冠之以“左”，勢必遠離了歷史本質的真實。若要求“是”，就不能不回溯“淚血大控訴”的歷史環境。這是打開改造舊軍隊歷史迷宮的鑰匙，也是起義官兵“心路滄桑”的精髓。

我採訪過的一位原國民黨軍上校團長，在起義兩年多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因追究其既往的歷史罪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這事，我詢問過許多人：當年的共產黨人是不是“左”了？

開始的回答，幾乎是異口同聲對中共“左”的討伐。可是，當我介紹了這位上校團長的歷史罪惡，以及相關的歷史背景後，人們的回答即刻發生了改變。

包括起義人員在內的老人都說：“處理得不重！”

中青年人則多表示：“不好說。”

不少中國人習慣於非此即彼二元分離的思維方式，喜歡把“一分為二”的辯證方法簡單化為“一個西瓜切兩半”，由此評說複雜的歷史事件，推斷“好人”與“歹人”，的確“不好說”。

我們可以設身處地設想一下：那位上校團長起義前，曾兩次領受過共產黨的“寬待俘虜”政策，但他返回國民黨軍隊後，卻要毫不留情地虐殺解放軍戰俘、殘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甚至對自己手下的連長也敢幹出“殺夫霸妻”的勾當。

對這樣的起義人員，誰敢把他留用於人民解放軍部隊，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權中安排個一官半職？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鄉剛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運動尚未開始，他回去後，能不能成為家鄉貧苦農民翻身解放的“障礙”，能不能被暴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顧忌。

起義部隊的人員成份太複雜了，類似情況不勝枚舉。

在政治承諾與政權穩定的兩難選擇中，最初，對這類起義人員，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而是把他們集中起來“管訓”，繼續組織學習、改造。

導致少數起義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直接歷史原因，是朝鮮戰爭。面對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侵略威脅，面對蔣介石集團倚仗美國的支持躍躍欲試要出兵朝鮮“反攻大陸”，為維護勞苦大眾來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國共產黨當年選擇鎮壓反革命運動來鞏固新生政權，是迫不得已的。

也正是在這歷史關頭，鑒於外敵壓境、國內匪患未平，“各大軍區尚有未經處理的起義與投降軍官大約三萬餘人”，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基於“政治上的需要”，發出《對起義與投降軍官處理辦法的指示》，要求“對這些人，應在實現我軍政治諾言及安定社會秩序兩個原則下，根據不同情況按量才選用，組織生產，資遣回鄉，長期管訓及懲辦首惡之方針，分別予以處理。”²⁶

然而，“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在泥沙俱下的歷史大

²⁶ 長舜等編：《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32頁。

潮中，必要的全局性的階級鬥爭常常蘊含著必然的局部錯案。由此，才有了“撥亂反正”時期“落實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歷史曲折。

我曾採訪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說到落實起義人員政策，老人最初也來氣：“我們這個黨呀，就是‘左’！”

可當我問到：“你們當年改造舊軍隊，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老幹部望著天花板，過了好一陣子，才自言自語地反問：“是啊，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改造起義部隊的安東整訓、興隆整訓和九臺整訓，老人是親歷者，對當年石人車站驚心動魄的大規模叛變事件，有過刻骨銘心的記憶。

歷史進程總是曲折的，不存在無崎嶇與坎坷的坦途。在舊中國，即便自由主義的“改良道路”走得通，也不能不付出社會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在相當長的“改良”過渡期內，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億萬勞動群眾繼續習以為常地面對地主惡霸扎進齊開文父親胸膛的那根血淋淋的梭鏢，²⁷ 數百萬國民黨士兵繼續麻木不仁地面對長官毆打林家保、黃金明、田文富的那根殺氣騰騰的青岡棒，²⁸ 就像美國《黑奴解放宣言》發表整整一百年間，廣大

²⁷ 起義士兵齊開文的父親是個佃戶，僅僅因為將地主已經開裂的鋤頭用斷，在發生爭執後，被地主用梭鏢捅死。見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第6章《洗心革面的改造》第1節〈淚血大控訴（一）〉，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²⁸ 國民黨軍隊長官毆打士兵林家保、黃金明、田文富的情況，見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第6章《洗心革面的改造》第2節〈淚血大控訴（二）〉，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另見《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4：扇耳光、打軍棍》《起義官兵淚血大控訴5：棒殺、刀挑、活剮逃兵》，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黑人民眾依然要繼續忍受殘酷的種族壓迫那樣！

在中國現代史上，“知識分子立場”就是這樣一種博弈於“帕累托優勢”²⁹下的無情選擇。

面對無情的歷史選擇，人們完全有理由設問：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的知識精英，如果能回歸當年，也被“國軍”用一根繩子捆去當壯丁，整日挨打受罵，其改良主義大旗還能打多久？

航空工程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墨菲定理”：凡是有可能出現差錯的地方，遲早會出現差錯。

在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的過程中，有的“差錯”可以預料，但難以避免。

這其中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史實：最先、最強烈要求追究個別起義人員歷史罪惡的，不是中共幹部，而是覺悟後的廣大國民黨起義官兵。

經歷了那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淚血大控訴”後，由於無可避免地引發了“奪過鞭子揍敵人”的階級仇恨，不少起義部隊的廣大官兵都曾紛紛要求共產黨槍斃幾名罪大惡極的軍官，以平民憤。胡宗南部第30軍一位副師長，起義前曾經利用職權雞姦了89名部下，在控訴運動中，義憤填膺的受害官兵甚至強烈要求把這位楊副師長褲襠裡的那個玩意兒割掉！³⁰

儘管，自改造海城起義部隊起，中國共產黨就對開展控訴運動作出了“不准打人”的紀律規定，但由於派入的政治工作幹部

²⁹ “帕累托優勢”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的博弈論著名定理，它有一個帕累托效率準則：經濟的效率體現於配置社會資源以改善人們的境況，主要看資源是否已經被充分利用。如果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須損害別人了，這時候就說一個經濟已經實現了帕累托效率。

³⁰ 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43頁。

政策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甚至是文盲，一名指導員要負責改造百十人的一個連隊，更由於有著幾千年奴性傳統的底層民衆難以發動，而控訴運動激發出來的義憤又常常帶有爆發性，衆怒難平，所以，打人的事情很難完全避免。

有的“差錯”，事先難以預料。

最典型的，是個別起義軍官離職返鄉或被資遣、復員回鄉後，正趕上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面對家人被鬥、家產被分，本人對過“土改關”又缺少思想準備，於是，被群眾運動的大潮吞沒。

還有一種“差錯”，則基於特定歷史時期穩定全局的政治需要。

國民黨各部隊編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統，高級政工人員均由國民黨中央直接委派，其職能帶有特務性質。但是，具體到個人頭上就不同了。在長春起義的國民黨第 60 軍政工人員中，確有特務分子，但也有曾澤生軍長為了抵制國民黨中央對雜牌部隊的控制而摻進去的“沙子”。還有一些青年學生於長春被圍困期間，為了“找碗飯吃”才當兵幹政工的，沒幹多久就隨軍起義了。

然而，在歷史轉折的大潮中，要準確區分敵友，談何容易？國民黨軍隊中有受嫡系排擠的雜牌軍，雜牌軍中有歸屬國民黨中央的政工系統，政工系統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學生，青年學生中又混雜有學生特務。政策松了，會給革命事業帶來隱患；政策緊了，則會擴大傷害面。

基於複雜的政治背景，國民黨第 60 軍起義後，為了防止特務分子煽動叛變，原國民黨政工人員被迅速調離，送軍政大學，邊組織學習，邊甄別考察，以確保部隊的穩定。全國解放後，對這部分國民黨政工人員的甄別有了結果，問題嚴重的人被留了下來，不是服刑，而是繼續“管訓”；問題不大的人，被資遣回鄉。

解放初期對這些起義的國民黨政工作人員的處理是溫和的。對他們處理的昇級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原來留在黑龍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訓”的人員，被追究了刑事責任；被資遣回鄉的人員，則因其有“特務嫌疑”的歷史，被當地群眾“管制”。

西方現代管理學有一個“容錯”原則，承認局部錯誤難以避免，在此基礎上設計“容錯程序”。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開展的階級鬥爭不是純“意志”的產物，它決定於當年客觀存在的階級狀況和國內外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在這難以逾越的歷史階段，局部的階級鬥爭擴大在所難免，合理的“容錯”也就成為歷史前進的必然代價。

也正是在特定時期合理“容錯”的基礎上，整個社會才產生了思維和行為的慣性，推動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極端。

面對哺育赤縣神州的母親河，如果有人站在若爾蓋草原，指證黃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園口大堤上指責當年黃河決口害中原，似乎，我們不能說“這不真實”，但是，這僅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實，而非本質的、整體的真實；如果有人嘆息黃河九曲無常，沒能“直濟滄海”，這也確實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卻是主觀的、學究的、脫離實際的。

評說中國革命輝煌與曲折的歷程，何嘗不是如此？

四、改造舊軍隊的曲折歷史能不能迴避

舊軍隊改造史是中國革命史的一個縮影。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第 50 軍，又是改造舊軍隊的典型範例。然而，當我涉足這塵封已久的歷史時，有人卻勸道：“控訴運動就不要寫了。寫了，有些起義人員不高興。”還有人則提醒：“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

情況也不要寫了。寫了，有些共產黨幹部不高興。”

如果聽勸，只有放棄創作，因為迴避前者，將掩蓋改造舊軍隊的歷史必然，迴避後者，將掩蓋改造舊軍隊過程的艱難，而這兩者又結構了舊軍隊改造史的完整過程。

中國人習慣於整體思維，其長處是善於把握事物本質和主流，但相隨的思維定勢容易以偏蓋全，把對立面的辯證關係簡化為“一個西瓜切兩半，吃一半來丟一半”。“為尊者諱”，就是由此而生的“戒條”。

改造舊軍隊是一段震撼心靈的不朽歷史，半個多世紀的塵封，在一些人看來，似乎可以簡化為一個“諱”字——為國民黨起義人員“諱”，為中國共產黨“諱”。

其實不然，已然的歷史有著歷史的必然。就像太極圖，“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

“國軍”改造史被塵封半個多世紀，曾經是政治鬥爭的策略需要。

解放戰爭期間，對改造起義部隊的控訴運動是不能大張旗鼓宣傳的，因為那時策反工作的重心在國民黨軍隊的上、中層，而國民黨軍官對中共策反工作抵觸情緒最大的，是“共軍要兵不要官”的傳言。曾澤生率部起義前請求不要“編散部隊”，陳明仁率部起義前提出“不能在整編部隊後進行清算和鬥爭”，都反映了對改造工作的誤解。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威脅，剛剛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承諾和政權穩定的兩難之間作出被動選擇，於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追究了極少數起義人員的歷史罪惡，加上“解放臺灣”政治攻勢的客觀需要，宣傳舊軍隊改造史依然不宜。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共和國從極端的階級鬥爭中解脫出來，進入了“撥亂反正”的年代。據軍事法院的工作人員說，當

年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工作本著中央“易粗不易細，易寬不易嚴”的文件精神，幾乎是“一風吹”。在長春起義部隊中，血債纍纍的，有特務背景的，起義時作為“反動分子”被先行扣押的，甚至破壞起義未遂的，基本上都落實了有關政策。此時的大局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宣揚舊軍隊改造史仍不合時宜。

歷史發展是辯證的。迴避舊軍隊改造史的合理性是一個動態過程，當執政黨了結了“落實起義人員政策”這一歷史“債務”之後，其合理性也隨之消失。

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作為“撥亂反正”的成就公諸於世了。據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站披露，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總政治部 1979 年 1 月 9 日的《關於落實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請示報告》被中共中央批轉後，“全國共認定了 45.4 萬多名起義、投誠人員的身份，為其中的 15 萬人在政治上平了反，為因追究歷史問題而被錯誤判刑的十多萬人撤銷了原判，為八萬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或者辦理了離休、退休手續，為 1.5 萬多名原來沒有工作、又無子女贍養的人，定期發給生活費或給予社會救濟，為原國民黨省、將級起義及投誠人員、起義有功人員提高了工資級別，為被錯殺者或者在服刑期間死亡的人的家屬在經濟上作了撫恤”。³¹

以“撥亂反正”姿態出現於“新時期”的“國軍史學”、“國軍文學”和“國軍影視”，也活躍了起來。一些作品在肯定“國軍”抗戰歷史功績的同時，或抹殺或迴避或忽視了“國軍”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

如此以國民黨官兵抵禦日寇之事，遮蔽國民黨政權欺壓人民之史，其客觀的輿論導向之實，不言而喻。

³¹ 中共中央統戰部：《統戰政策的全面落實》，中央統戰部網站<http://www.zyztzb.cn/zyztzbwz/theory/lishi/lishi97.htm>。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繼續淡化、迴避改造“國軍”的輝煌歷史和曲折歷程，必然欲蓋彌彰，在人們“文過飾非”的抱怨中，鑄造成適得其反的錯誤，進而動搖中國革命的道義根基。

更為重要的是，舊軍隊改造史存儲了一組可以解讀中國革命史的密碼，這就是必須把中國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反抗、艱難的階級解放和民族獨立這一 20 世紀的歷史大背景中去認識。

章太炎曾說：“欲亡其族者，必先誣詆而滅其史。”

立國正史，人間正道！

五、曲解中國革命的原因試析

如今的中國，否定中國革命的人並非個別，探究其形成原因，對正史立國很有必要。

與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說到舊軍隊改造史，親歷者們幾乎無一不在整體上給予肯定，即使是坐過共產黨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個偏僻的小鎮上採訪過一位耄耋老者，雖然，他 24 度春秋是在共產黨的鐵窗和勞改農場裡度過的，但這位原“國軍”上校還是堅定地認為，國民黨不能救中國，因為“國民黨是懸吊在半空中的，沒有基礎，完全從個人利益出發”，不像共產黨扎根於人民群眾之中，老人甚至把共產黨領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並排掛在堂屋牆上，並盛讚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密切聯繫群眾”的政治決議。

對此，有人主觀地認為，老人的這種人生態度是劫後餘生的人格扭曲。

其實不然，從總體上看，不同年齡層的人對舊軍隊改造史的不同評價，也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任何人對歷史的評價，都要依賴本人記憶庫的現成貯存，而對記憶資源的檢索、提煉和使用，則受制於記憶規律。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人的記憶受“序位效應”影響很大。所謂“序位效應”包括“初始效應”和“時近效應”，就是說，最初和最臨近的事情最容易記憶。

中國現代史對中青年人來說，留在“初始”記憶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義教育，發生“時近效應”的，多是對“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批判，而受制於思維慣性，其歷史觀很容易延伸至對整個階級鬥爭歷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雖然有著與中青年人相同的“時近”記憶，但他們多數人“初始”記憶烙印在心中的，卻是“淚血大控訴”的人生感受。

認知上的規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華僑告訴我：“在國外，你講中國的‘舊社會’，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為在他的眼裡，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就像美國的共和黨取代民主黨、英國的工黨取代保守黨、法國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樣，社會制度不會有什麼變化。”

“老外”不懂舊社會，除了政客刻意的輿論誤導，有其歷史成因。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國外的，有幾人是翻身解放的工農群眾？即使少數“奴才”隨主子出逃，他們又掌握了多少知識分子特有的“話語權力”？

隨後的移民，受“時近效應”的支配，向“老外”講述的中國國情，多是共產黨執政後的失誤。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大歷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淺的視野裡消失了。

對於否定中國革命的某些學者來說，他們除了缺少超越當代人恩怨得失和視野局限的“大歷史觀”，以及缺少辯證的思維方法外，還有著更深刻的主觀原因，這就是“知識分子立場”。

200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期間，不少媒體、網站圍繞

如何評價國民黨抗戰作用等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熱鬧話題就是“抓壯丁”的真實性。

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在某報刊登的講話強調：“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³² 許多著名網站和論壇上大量轉載、轉貼並廣為流傳的〈流沙河的抗戰回憶：99%的壯丁是自願去的〉甚至宣稱：《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³³

對於流沙河先生的斷言，我曾在〈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一文中，有過專門批駁，這裡關注的是其斷言的成因。³⁴

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趙祖謨的《〈理想〉的背後——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³⁵

縣政府軍事科專司兵役工作。據金堂縣第三任軍事科長鄒浚哲著文記載，該縣徵調壯丁“純粹以權勢來定，都是強徵的無勢無錢的貧苦百姓，或估拉過路苦力、小商和遊劫散兵”，“強拉買賣壯丁成風”，“貧苦民衆慘遭蹂躪無處哭訴”。³⁶

從常理上看，情感生成於交際圈子，視野受制於生存環境，存在決定意識，我也不例外。

我對舊軍隊改造史認識上的變化，得益於我對不同階層起義人員的全面採訪。最初，我接觸的多是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

³² 流沙河先生的發言，見《成都晚報》2005年7月14日第32版。

³³ 見新浪網〈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願去的〉：<http://cul.sina.com.cn/bbs/2005/1010/17122590.html>。

³⁴ 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³⁵ 趙祖謨：〔新課文〕《〈理想〉的背後——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語文建設》2003年第3期（流沙河的《理想》為人教版課標教材七年級（上）中的一篇課文）。

³⁶ 鄒浚哲：《解放前金堂縣徵兵概況》，《金堂文史》第391~392頁。

考慮問題自然站在“落難”軍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採訪到廣大士兵群眾的“淚血大控訴”，審視歷史的立場就不能不發生位移。

“知識分子立場”是一個歷史話題，由此出發，我們不難設想：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狂飆般地掃蕩傲視民眾、鄙視勞動、輕視實踐的千年積習，時下知識界、文藝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草根民眾說話？

也不難推斷，當下教育界精英刪去《包身工》等課文背後的歷史觀與山西“窯奴”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繫。

對中國革命史的曲解，還折射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文化傳統的核心是價值觀。東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是反向的：西方人奉行“權利本位”，主張義務服從於權利，高揚“工具理性”的旗幟，更關注個人的權利；東方人奉行“義務本位”，主張權利服從於義務，高揚“價值理性”的旗幟，更關注整體的利益。

差異的文化在交流中，有融合，有衝突，也有滲透。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大量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我國思想界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然而，“陰在陽之內”，我們在借鑒西方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同時，西方借助其“話語霸權”的勢能，也在影響著東方的“知識分子立場”，並通過思想界的爭論，企圖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走向。在當代中國，評價歷史，相對而言，有人只注視貴人、文人的“自由”狀況，無視草根民眾的生存狀況；研究現實，有人只重視“金領”、“白領”階層關注的“權利平等”，漠視“藍領”、“圓領”（農民和下崗工人）階層企盼的“事實平等”就是一個例證。

用西方的道德準則去度量中國民眾的心靈感受，用西方價值取向的函數關係去求解中國社會歷史變量的函數題，又如何不推導出錯位的題解？

遠離勞苦大眾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評價是荒謬的，但自由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作用卻是複雜的，他們對中國革命的否定性評價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僵化理論和極端實踐的報應。真理，只要陷入單一的理論環境，就必然要走向極端。

正是從“思想生態”的意義上，應該肯定自由主義在新中國思想史上的歷史貢獻。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態”的環境中，我們才有所感悟：批駁對中國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於形而上層面，墮入任西化理論“忽悠”大眾的學理陷阱，應該讓更多的人瞭解舊中國草根小民備受欺壓的生存狀態，以及底層民衆翻身解放艱難的啟蒙過程。

六、研究舊軍隊改造史的價值

新中國成立後，反映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百萬大軍起義、投誠的書很多，但是，如何消化改造這些來自敵對營壘的官兵，史料鮮見，專題的史學研究和紀實文學基本上也是空白。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的一個獨特的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的實踐呈現如下特點：

一是改造量大：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 188 萬人。³⁷ 這絕不是個小數，美國 2001 年“9.11”事件時的現役軍人總數也不過才 140 萬人。

二是改造能力強：對昔日的戰場對手，派去一名指導員，就能改造百十人的一個連，派去幾百人的工作團，就能改造幾萬人

³⁷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公佈的戰績，三年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 177 萬人；從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到 1946 年過渡時期內，還有 11 萬人起義、投誠；兩項合計為 188 萬。轉引自蔡惠霖等：《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續集第 5 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的一個軍或一個兵團。

三是改造全面、迅速、徹底：對舊軍隊的改造，包括對官兵和眷屬的全體改造，包括組織、政治和思想的全體改造，重心在於思想改造。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拆”，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四是用起義官兵滾動改造起義部隊：以改造滇軍為例，解放戰爭初期，30多名老紅軍、老八路改造了海城起義的第184師；兩年後，他們帶著幾百名海城起義官兵又改造了長春起義的第60軍；又過了一年，再帶著幾百名海城起義和長春起義官兵又改造了蔣介石嫡系第20兵團和電視連續劇《傻兒師長》《傻兒軍長》《傻兒司令》歷史原型范紹增的袍哥武裝。

昭示這段塵封半個世紀的史實，有著許多不可低估的社會價值。

今天，不僅知識界有人否定中國革命，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些職務或學歷不低的人也認為：若無西安事變，國民黨會把中國建設得比現在好！

國民黨能不能救中國，國民黨起義官兵最有發言權。

張官迎在國民黨軍隊裡是管後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長，採訪中，開始，他不滿某些文藝作品過分醜化國民黨官兵，講了不少滇軍將士英勇抗戰的事蹟，還講了抗戰期間安恩溥師長因為發現部隊沒給老百姓上門板、捆鋪草，而鞭打營、連長的故事。可是，當我提出當代部分中青年人的這種認識時，老人的態度猛然急轉：“不對，不對，不對！國民黨哪能救中國？國民黨淨禍害老百姓！抗戰也是繃面子，部隊是私人的財產，將領淨打保存實力的小算盤。不對，不對，不對……”

曾任國民黨第182師副師長的李佐聽了以後，笑得幾乎氣都喘不過來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問了一句：“他們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衆叛親離的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政治上，其黨政軍警官員與當地封建地主階級之間已不再有天然聯繫，經濟上，他們把大陸幾億人民的鉅額財產裹挾到了小島，基於獨特的社會歷史條件，才得以進行臺灣式的改革和建設。

也正是因為起義官兵的親身經歷和切身感受給後人留下了認識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獨特視角，那位曾斷言“‘國軍’和‘共軍’一個樣”的朋友看了本書後，才有了天壤之別的歷史觀轉變：“這本書很有說服力，很有震撼力，看了以後，確確實實感到中國共產黨太偉大了！”

中國共產黨舊軍隊的改造，還映射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

改造舊軍隊的專家徐文烈政委曾經這樣評價國民黨軍官：“舊軍閥軍隊是以私人為中心的部隊，軍官特別喜歡講感情，不論哪一級，只要你把主官關係搞好了，取得他對你的一定信賴，一切工作就談得通，行得通。感情搞不好就阻礙重重。”

“不講感情”，“不要親情”，曾經是國民黨詆毀共產黨的一個經常性的話題。當年的共產黨人在改造舊軍隊的過程中，也確實猛烈的批判過“只講‘同鄉’、‘親戚’、‘故舊’等封建拉扯的壞習氣”。如今，就在當代一些共產黨領導幹部都“痛改前非”稱兄道弟認“乾親”的時候，一位前“國軍”團長卻固守著半個世紀前曾經煎熬過他的道德原則。

他就是李崢先。老人於近九旬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哈爾濱一位67歲入黨的退休教授出於敬佩和仰慕，千里迢迢要認李崢先為“義父”。面對人之常情，曾為親情所困更渴望親情的李崢先，卻執意相勸：“不行，不行！我們現在都是共產黨員，黨內是純潔的同志關係，做同志不是更好嗎？”

從文化傳統的角度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道德準則“本是同

根生”。在國民黨軍隊，做人的第一要義就是“講義氣”，要想“吃得開”，就得把袍澤之情、團體利益放在首位。在共產黨內，“高於一切”的“黨性原則”是人民利益，個人的權利也排在後面。也正是基於“同根”的道德坐標系，許多起義官兵才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小義”，認同了共產黨無私的“大義”。

然而，“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當年批判舊軍隊“特別喜歡講感情”，李崢先認同了“大義”，卻付出了“滅親”的代價；共產黨人則在“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黨性原則下，把黨內鬥爭和階級鬥爭推向了極端。如今撥亂反正，為“人情”“正名”，卻又難以遏制“私情”氾濫。

面對當今共產黨內嚴重的“徇私”問題，我請教經歷滄桑鉅變耄耋之年的李崢先：“共產黨會不會像當年國民黨那樣垮臺？”

老人的回答是堅定的，堅定得令我這個黨齡長於他多年的晚輩自愧弗如：“不會，不會！為什麼？共產黨‘一雷天下響’，誰能做到？只要共產黨的大旗不倒，共產黨就不會垮臺。共產黨的力量在人民群眾中！”

華夏五千年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只要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還是“義務本位”，在 960 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中國共產黨旗幟上昭示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大義”，就一定能匯聚億萬人民群眾對歷史無以抗拒的推動力。也正是基於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感知，我贊同著名作家張賢亮的一個認識：中國人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

研究舊軍隊改造史還有著社會科學上的意義。

20 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可謂之群星璀璨，讓人目不暇接，其中行為科學的創立佔有里程碑地位。當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為了探討如何調動人的工作積極性，選擇西方電器公司的霍桑工廠為實驗基地，進行了照明度實驗、福利實驗、訪談實驗、

群體實驗等一系列實驗，期間，差點宣告失敗。整整九年後，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精英們才恍然大悟：金錢，不是刺激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惟一動力。人，有著更重要的追求。

行為科學創立後，由此開端，1933年，心理學家梅奧提出了“社會人”的人性假設；1954至1960年，馬斯洛、阿基里斯、麥克雷戈等學者提出了“自我實現的人”的人性假設；1965至1974年，薛恩、莫爾斯和洛希等學者又提出了“複雜人”的人性假設。

然而，就發掘人的能量而言，無論是發掘的廣度、深度，還是能量轉換程度，“山姆大叔”的心理學實驗都遠遠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改造百萬國民黨起義官兵的偉大實踐相比擬：早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就有了“支部建在連上”和建立士兵委員會等深刻理論和成功實踐；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於昔日的戰場對手中，培養了上百萬忠誠的革命戰士，其中不少人成為思想政治工作幹部後，於同時代西方鳳毛麟角的大心理家才敢涉足的領域，又一展才華！

可惜，一方面，由於政治偏見或文化差異等原因，當代西方現成的理論難以從心理學、社會學上全面、徹底地解釋中國那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難以解釋百萬國民黨起義官兵幾乎是瞬間的靈魂聚變；另一方面，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卻久久塵封，有關史料幾乎無人搶救，有關文獻似乎無人整理，有關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覽幾乎為零。

七、感喟前輩心路滄桑

面對父輩的滄桑心路，面對前驅的曠世奇功，面對至今閒置的珍貴遺產，³⁸ 作為晚輩，我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言難盡的心靈感慨。

³⁸ 舊軍隊改造史中的思想營養，最近得到了著名本土企業管理學家周大江先生的

中國革命歷史的輝煌與曲折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完整，不但決定於我們民族完整的根性，還決定於我們民族完整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狀態。翻開一部前輩淚血凝寫的中國革命史，不難看出，層層疊疊阻擋中國人民翻身解放滾滾洪濤東行流向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三座大山，把歷史洪流逼向險象環生百折九曲迴灣的，還是這三座連為一體的大山！

二百多年前，美國《獨立宣言》鄭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們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裡被賦予了某種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了損害這些目的政府，人民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可是，在中國千千萬萬個“齊開文”³⁹的親人被土豪惡霸侮辱、殘害的年代，美國政府及其喉舌為什麼不替幾萬萬勞苦大眾講講“人權”？憑什麼維護那個腐朽的制度？憑什麼阻撓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當國民黨軍隊中千千萬萬個“羅珠成”⁴⁰被官長剋扣糧餉、

高度重視。在《黨史商鑒》（該書作為唯一一本管理學著作入選《書摘》雜誌社和《博覽群書》雜誌社聯合評選的“2006年度20本好書”，並被多家大型企業採用為管理層必讀教材）的前言中，周大江先生列出四本“本書所引用的主要黨史資料”，《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列於《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大辭典》之後。見周大江著《黨史商鑒》，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頁。

³⁹ 起義士兵齊開文的父親是個佃戶，僅僅因為將地主已經開裂的鋤頭用斷，在發生爭執後，被地主用梭鏢捅死。見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第6章《洗心革面的改造》第1節〈淚血大控訴（一）〉，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⁴⁰ 羅珠成在給國民黨暫編第21師第2團某軍官當勤務兵時，僅僅因為丟失幾兩大煙土，就差一點被軍官殺掉。在舊軍隊，羅珠成還親眼目睹了軍官強迫逃兵所在連隊全體士兵活剮逃兵的慘劇。見高戈里《一位“國軍”勤務兵的故事》，原載《青年作家》1998年第11期。另見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毒打、殘殺的時候，美國政府及其喉舌為什麼不替幾百萬士兵講講“人權”？為什麼不“制裁”那個腐敗的政府、殘酷的軍隊？憑什麼支持國民黨政府反人民的內戰？

是美國政府“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延長了中國的內戰，致使中國勞苦大眾流淌了更多的腥血酸淚！

1946年10月，在石人車站，楊朝倫等就是因為倚仗美國後臺老闆，才把一千多“三迤”⁴¹子弟拖回深淵，以至於多少人流光了死無葬身之地的一腔污血，多少人淌不完愧悔當初的滿面眼淚！

1947年6月，在吉林市，義薄雲天於舊軍隊的隴耀師長，就是因為掂量了在對壘兩軍力量對比的天平上壓著的“美援”籌碼，才躊躇於光明與黑暗的岔路口上，以至於日後說起無謂喪命流血的家鄉子弟，總有止不住的淚水滴灑衣襟。

1948年12月，在吉林九臺，高汝雲連20多名士兵叛變，就是因為相信了“美國支持國民黨打回東北”的傳言，四人才送掉性命！

20世紀50年代初，當美軍坦克碾向中國邊境，杜魯門總統和麥克阿瑟將軍以原子彈相威脅時，中國人民不得不以自己幾十萬優秀兒女的血肉之軀“築起我們新的長城”。數萬參加抗美援朝的國民黨起義官兵之所以同仇敵愾，捨死忘生地拼出漢江50晝夜阻擊戰等輝煌戰績，就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心願：“決不讓美國鬼子把國民黨弄回來！”

論激勵作用，這話，絕不亞於1775年打響列克星敦槍聲時，北美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口號：“不自由，毋寧死！”

面對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一如既往的威脅、干涉和侵略，億

⁴¹ 清康熙、乾隆年間設迤東、迤西、迤南三道，民國時合併為雲南省，故雲南省有“三迤”之稱。

萬剛剛脫離苦海的中國人民敢不“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能不滑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深淵？

中國人民選擇的革命道路沒有錯，只是在該轉折的時候，朝著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方向上“多走了一步”。

許多飽嘗“階級鬥爭擴大化”苦楚的國民黨起義人員始終無悔義舉當年，這絕不是忍辱偷生蠅營狗苟。

為什麼？

因為馬克思主義化的“大同”理想對價值取向偏重人生責任的炎黃子孫，有著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像華夏大地百川歸海，這感召力，能將億萬甘冽的清泉、高懸的飛瀑、陰溝的污水、恬靜的小河、咆哮的山洪，匯聚成煙波浩渺一往無前的滾滾洪濤，攜石裹沙，繞過高山峻嶺層巒疊嶂，穿過礁島險灘荒原曠野，歷盡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向著理想的“大同”目標奔湧不息。

聚集在共產黨旗幟下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這洶湧澎湃的歷史大潮中，蕩滌了世世代代逆來順受的奴性，凝聚了全民族曾一盤散沙的人心，挺起了一百多年來被幾百個不平等條約壓彎了的腰桿，建立了使帝國主義不敢再欺辱我們的強大國防，奠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得以騰飛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正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包括起義人員在內的不少前輩以超越自我為代價，來認同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康並讓子孫後代永世景仰的人格境界。

這，也是那些沉溺於小我得失和小資情調者永遠無法理解的人生情懷。

我們會深刻反思自己的歷史，特別會深刻反思自己“多走了一步”的歷史，但決不割斷歷史葬送我們民族的前途。

改革開放以來，在赤縣神州生機盎然的土地上，一批又一批有志振興中華的精英學者，從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文化

等多視角，探尋苦難祖國為“九九歸真”實現“大同”，歷盡“八十一劫難”的真正原因。

尋覓前輩們的心路軌跡，反思中國革命的淚血歷程，回溯時差幾十年的歷史原生態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幕幕完全陌生的歷史畫面。我們不能用今天建造三峽電站的科學思想和技術條件，去苛求兩千多年前偉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何況，都江堰水利工程有著三峽電站無可比擬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崇高境界。

同理，反思歷史也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歷史局限和歷史作用。

當前，某些作品在論及中共歷史上“左”的錯誤時，或停留於對主觀指導的批判，或沉溺於游離歷史大背景的“人性”剖析，缺少對歷史環境全面、系統的客觀展示，更缺少對歷史本質的深刻挖掘；另一類作品在肯定國民黨軍抗戰功績的同時，或抹殺或迴避或忽視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即對內殘酷的階級壓迫。這在客觀上會誤導人們對中國革命史的評價，進而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一旦被否定，勢必影響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常走向，並有可能使我們再次付出淚血代價。

因為，在當代中國，一方面，被新自由主義者奉若神明的資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餘價值，而不良資本所有人和資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過依仗權貴榨取草根小民的淚血，來實現其資本的積累與增值；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旗幟過去曾經今後也能夠聚集億萬底層民衆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而不同階層的利益之爭一旦白熱化、規模化，毛澤東生前擔憂的“血雨腥風”，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祭奠無數前輩的亡靈和淚血，應該向使我們付出淚血代價的

帝國主義政府及其喉舌“討個說法”，但重要的是藉以鞏固無數先驅者用淚血澆注的共和國大廈，更重要的是，決不能讓我們的後代重蹈浸透了前輩腥血酸淚的覆轍！

反思中國革命的淚血歷程，還將有助於為全人類的文明事業發掘東方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

改造舊軍隊，中國共產黨對昔日戰場對手潛能的苦心發掘，百萬起義官兵於歷史瞬間展示的靈魂聚變，在一部世界史上，空前絕後，舉世無雙！

梅奧、馬斯洛、麥克雷戈等學界泰斗若還活在此世，真該來到這片值得正直的社會科學家開墾的沃土地，為全人類汲取歷史的思想營養。我敢說，其社會價值、其歷史意義、其學術收穫，決不會在當年著名的“霍桑實驗”及以後的一系列實驗之下！

在《心路滄桑》一書中，我並不是要著意渲染什麼，也不試圖迴避或掩蓋掩飾什麼，我要奉獻給讀者的是一部塵封半個世紀的真實歷史，以及由此組成的許許多多真實的故事。

回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起義部隊的爭取和改造，我自度，以個人閱歷和水平，難以駕馭這一重要的歷史題材，無論記述的廣度和認識的深度，都頗感力不從心，但有一點是明確而堅定的——我所敘述的真實歷史，是反映歷史本質和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歷史真實。